

刘敬 编著

齐鲁人考索

通检(一)

齐鲁出版社

齐鲁人物论略

——《齐鲁人考索》丛书序

张岱年

周初分封诸侯，封太公于齐，封周公于鲁，齐、鲁号为大邦。至春秋之世，齐国管仲相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为五霸之首。春秋末年，晏婴相景公，亦有名于时。而鲁国保存周礼最为完备。昭公二年，晋国使韩宣子聘于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孔子少而好礼，对于夏商周三代文化理解较深，于是设教授徒，将三代典籍传授于一般平民，有教无类，弟子自远而至，创立儒家学派。战国初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于是创立墨家学派，与儒家并称显学。

战国初年，齐田氏代姜，田齐桓公设稷下学宫，召集天下游学之士。齐威王之时，邹忌为相，田忌为将，以孙臆为军师。至宣王之时，稷下复盛。“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著名的稷下学士七十六人，今可考见者，于邹衍、淳于髡、田骈、慎到、环渊等人之外，尚有宋钘、尹文、邹奭、鲁仲连以及荀子等等。当时齐国之士，还有不在稷下的陈仲。陈仲本是齐国的贵族，而“辟兄离母，处于於陵”，孟子说：“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孟子·滕文公下》）陈仲是坚持自食其力的独行之士。同时齐国的田文号孟尝君，是战国时代四公子之一，养门客三千人。

春秋战国之时，齐鲁实为中国北方文化学术的中心。当时齐鲁之名家杰士辈出，实为先秦文化史的重要内容。

世侄大钧认为，齐鲁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非同寻常，探讨中国历史思想文化传统，齐鲁文化不可不深究明察，而欲知一国之历史文化，必先知此国之历史人物，于是与王明强同志一起，对先秦文献中全部齐国、鲁国人物（包括客居者）的全部有关材料进行详细统计、全面整理和系统考论，主编一套史料完备、新颖实用的齐国、鲁国人物研究专著，定名为《齐鲁人考索》。

大钧、明强本于我关于周人勤奋、勇猛而稳重、宏阔，其思想表现出一种深沉、雄厚、闷肆、创造和前进的气息的论述，认为周人这种特点在齐鲁人物尤其是儒家学者身上有充分的体现。他们赞同我的看法：周代为我国文化初成熟之时，而孔子以周文王的继承者自居，他对夏商周三代的文化进行了一次总结，建立了儒学。孔子是集古代思想之大成、开创思想界新时代的人，是把其前代思想总结起来而成为一个一贯系统的哲人。世界哲学有三大系统，即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与西方哲学。每一大系统的哲学都有其辉煌的开创时代。这哲学思想的开创时代，有的西方学者称之为“轴心时代”，这在中国是先秦时代，在西方是古希腊。现代西方有很多学者认为古希腊哲学至今仍是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源泉。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而中国的先秦时代的经典与诸子学说乃是汉唐宋明哲学发展的思想源泉。春秋战国时期，孔墨、老庄、孟荀的著作，在二千多年的长时期中，确实提供了思想发展的坚实基础。而这六人中，孔、墨、孟、荀都是齐鲁人物（包括客居）。先秦诸子实为中国文化精华之所在，除以上六人及其后学的著作即《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为中国知识分子之所必读外，还有两部齐鲁人物的著作即《管子》和《孙子兵法》也在必读之列。《汉书·艺文志》中，《论语》在《六艺略》，《孟子》在《诸子略》，后来都列入“十三经”，它们在本质上属于子书。此外，五经中的《周易》又分经、传，其中《周易大传》传说是孔子所著，事实上应是孔子再传弟子所著，本质上亦属于子书，其中精粹之语很多，是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所应理解的。《礼记》本是孔门七十子后学所著，许多篇章取自儒家子籍，亦应选读。这丰富的重要文献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粹思想，于此亦可见齐鲁人物的非凡成就及齐鲁文化的

博大精深。

大钧、明强本于我关于中国文化刚健有为基本精神的论述，认为齐鲁人极富刚健有为的精神。他们赞同我的看法：孔子就是一个刚健的人，他肯定“刚”是一种有价值的品德。《论语·子路》记载他说：“刚毅木讷近仁。”又《公冶长》记载：“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枋。’子曰：‘枋也欲，焉得刚？’”后来《周易大传》提出“刚健”的学说，其渊源实在于孔子。孔子刚毅木讷、气象深厚，重现实，重人力，圆融、中正而极富积极勇进的精神。他“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同上），表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他坚决主张有所作为，“知其不可而为之”（又《宪问》），坚忍不拔，栖栖惶惶，奔波周游，图谋改良当时的社会。孟子宣扬孔子学说，进一步发挥了宏毅刚大的精神，他鄙视“以顺为正”，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生活准则（见《孟子·滕文公下》），他认为大丈夫应有独立的人格，遵守一定的准则，不屈服于外在的压力。而墨子比孔子更刚毅，却不及孔子之宏融。墨子反对周人的尚文，他要仿效大禹治水的精神。他出身农工，故能极端刻苦，丝毫不要享乐。他和他的弟子们“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表现了可歌可泣的卓越的自我牺牲精神。虽然“其行难为也”，但体现了积极救世的崇高意志。墨子将孔子思想的一半极端发展，而排斥其另一半，但总的看，儒墨所争只在小端，他们都尚人为，积极奋斗，刻苦救世，刚健弘毅，不怕牺牲。墨虽反儒，然其最根本的思想与儒无殊。

大钧、明强本于我关于中国古典哲学价值观的论述，认为齐鲁人物在这方面有突出的贡献。他们赞同我的观点：春秋时期，鲁国贵族叔孙豹阐述著名的“三不朽”说，这“三不朽”说对于后人有着深远的影响。《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所谓太上就是最有价值的。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就是肯定德、功、言都有价值，而以立德为最上，即肯定德是最高价值。孔子也以道德为至上，他提出“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好仁者无以尚之”（又《里仁》）的命

题。孔子所谓义指道德原则，义的内容就是仁，仁是最高的道德规范。孔子以为道德的价值高于物质利益，其实际意义是认为人的精神需要要比物质需要更为重要。力与德的关系问题是关于人生价值的一个重要问题，孔子言论表现了重德轻力的倾向。墨子与孔子不同，他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最高价值。他说：“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墨子·兼爱中》）墨子以利于天鬼国家百姓为言论行动和道德的最高准则。《墨经》以“利”解“义”，云：“义，利也。”（《经上》）此利指公利而言，义就是公利。他认为义所以可贵，在于义是有益于人民的。墨子把道德与功用结合起来，他认为，任何事物必有一定的用处才有存在的价值，否则就没有价值。荀子批评墨子说：“上功用，大俭约而慢差等。”（《荀子·非十二子》）墨子的价值观可以称为功用价值论。与儒家不同，墨子比较重视“力”的价值，强调力的重要。墨子认为人与别的动物不同，必须靠用力才能生存。在墨子的思想体系中，力与德是统一的。管子学派认为人有物质需要，也有精神需要，而物质需要是精神需要的基础。《管子·牧民》中说：“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仓廩实、衣食足，是物质需要；知礼节、知荣辱，是精神需要。齐国的晏婴说：“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见《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意思是，生活丰厚，器用便利，然后端正德行加以节制。这是一种兼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观点。孟子则认为人人有“耳目”、“口腹”的物质要求，又有内心的精神要求，其间有价值的不同，他更强调精神生活的价值。孟子讨论了“生”与“义”的问题，他认为，生是重要的，义也是重要的；如果二者不能两全，应舍生而取义。生命固然重要，人格尤其重要。孟子“舍生取义”的名言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形成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与生义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义利问题，孟子严格区分了义与利。与墨家不同，孟子所谓利指私利而言。孟子更将“利”与“善”对立起来。他尽力反对追求私利，但也不谈论公利。他认为道义的价值高于一切物质利益。孟子还区别了德与力，他认为德的价值高于力的价值。和孟子一样，荀子也极力贬斥只知道追求物质利益的人，他认为义是保持人类生活安定的必要条件。

他把道义与势利对立起来,重道德而轻富贵,这是儒家的共同观点。荀子以为价值的最高标准是“全尽”,完全而精粹才是最有价值的,这是荀子关于价值标准的学说。荀子亦谈到德与力的问题,他认为,有力者应为有德者服务,德贵于力。但又认为治理国家应兼重德力,既充实国力,而又以德服人,这样就可以常胜了。这个观点是比较全面的。孔、孟、荀所反对的利都是指私利而言,但又认为公利也还不是最高价值,最高价值是道德理想的实现。这也就是说,人们不但有物质利益,而且有精神要求,提高精神境界才是最重要的。儒家强调道德的尊贵,高度赞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志士仁人,这对于中华民族的成长和发展,确实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关于人的价值的学说,大钧、明强赞同我的观点:儒家和墨家都肯定并重视人的价值、尊严和独立人格,而法家则对这些不重视。例如,孔子认为人的基本的精神需要就是要有独立的人格,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尊重各自的独立人格,这是道德的基本原则。孔子哲学的核心观念是仁,其所谓仁的主要意义是“爱人”,“爱人”即爱众,即其所提倡的“泛爱众”。孔子有两句名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匹夫就是平民,孔子认为平民具有不可夺的志,即具有独立的意志,一个人具有独立意志,就具有独立人格。孟子明确提出关于人的价值的学说,他认为人人都有自己固有的价值,称为“良贵”,亦称“天爵”(见《孟子·告子上》)。这固有的“天爵”、“良贵”就是道德品质,是天赋的,是不可能剥夺的。孟子肯定人的价值,所以要求人与人之间应相互爱敬,要把人当人看待,这是孟子的基本观点。他以“不忍人之心”即“恻隐之心”为道德的出发点,恻隐之心即同情心,亦即对于别人的痛苦抱有同情而试图加以救助,这是道德行为的基本。在此基础上,孟子更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名言(见《孟子·尽心下》)。荀子也肯定人类具有高于其他物类的价值,肯定意志的自由。在儒家学者中,荀子对天地之生人之所以为贵阐述得最为明确。荀子认为,人所以最贵,在于有义。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这是中国最早的存在层级

论。荀子讲“性恶”与孟子讲“性善”不同，但承认人的特点是“有义”则与孟子相同。墨家虽然不多谈“人贵于物”的问题，但墨家讲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的特点却更为精切。墨家初步认识到劳动是人类的特点，强调人的特点在于靠劳力来维持生活。墨家所谓“力”也包含“听治”之类的政治活动。墨家宣扬“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具有提倡扶危济困的传统。孟子批评墨子兼爱说“是无父也”，这是对于墨子的曲解。墨子宣扬“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主张爱人如己，并无“无父”之意，而是反对家族本位。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展望二十一世纪》中有对于墨子兼爱的赞颂，汤因比说：“把普遍的爱作为义务的墨子学说，对现代世界来说，更是恰当的主张。”（425页）汤因比的学说确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法家的观点则与儒墨不同，他们不重视人的价值，不尊重个人的独立人格。法家论人，强调人的“自为”，即谋求个人的利益。稷下学者慎子说：“人莫不自为也。”（《慎子·因循》）《管子·七法》当中更说：“治人如治水潦，养人如养六畜，用人如用草木。”这就是把人与牛马草木同等看待了。

大钧、明强赞同我的观点：中华民族素有维护民族独立、为报国而献身的优良传统。孔子称管仲为仁，其理由即是管仲保卫了华夏的文化使不受夷狄的凌侵。他称赞管仲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从此以后，维护民族的尊严，保卫民族文化，便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在古代，爱国与忠君是密切联系的，但也有一定的区别。《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述晏子在崔杼杀君之后说：“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晏子区别了君与社稷，这是有重要意义的。社稷指国家政权。君与社稷的区别即君与国的区别。孟子则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已见上）又说：“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又《尽心上》）亦区别了社稷与君。所谓“安社稷”即保卫国家的主权。“安社稷”不仅是忠于君而已。应该承

认,历代反抗异族入侵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志士仁人,确实是爱国主义的民族英雄。

大钧、明强本于我关于中国文化和与中的基本精神,认为齐鲁人特别提倡中和。他们赞同我的观点: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有所谓“和同”之辨。“同”是简单的同一,“和”是众多不同事物之间的协和。西周末年的史伯提出了“和”的观念,并加以明确的解释。他区别了“和”与“同”,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和实生物”,即“和”能产生新事物;“以同裨同”,即把相同的事物加起来,是不能产生新事物的。不同的事物相互为他,以他平他即是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亦即多样性的统一(见《国语·郑语》)。“和实生物”确实是一项非常深刻的思想。春秋时齐国的晏子也论证了“和”、“同”的区别,他所谓“和”,跟史伯所论一样,他说:君、臣之间,臣能提出不同的意见,君能容纳不同的意见,然后可称为“和”(见《左传·昭公二十年》)。史伯、晏子都强调“和”的重要,他们关于和同的思想,一是要求多样,二是要求平衡。这是一种促进文化发展的思想。孔子也区别了“和”与“同”,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看来孔子是同意晏子关于和同区别的言论的。孔子对于和、同之辩未多讲,而提出了“中庸”的观念。孔子宣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又说“过犹不及”。后来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篇》,对中庸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于是中庸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庸是肯定许多事情有一个适度的问题,不宜过,也不宜不及。这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是必要的,但是在社会变革的时代,如果固守原来的度,便可能妨碍社会的前进。我认为,中庸不是无条件的。中庸观念不如“和”的观念更为重要。和指多样性的统一,实为创造性的根本原则。和是兼容多端之义,今称之为“兼和”或“和谐”。和,一方面是与“同”相对立的;另一方面是与“争”相对立的。

大钧、明强本于我关于中国传统哲学中分析方法的情况的论述,认为齐鲁思想家在这方面有重要的特点。他们赞同我的观点:孔子兼重学与思,宣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肯定了思的必要。孟子提出“心之官则思”的命题,宣称:“思则得之,

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虽然他所谓思主要指关于道德的思考,还是充分肯定了思的作用。孔孟重“思”,《中庸》更重“辨”,由此看来,儒家不排斥分析。儒家之中比较讲究“名辩”之学的是荀子,但荀子更宣称:“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磋而不舍也。”(《荀子·天论》)把对自然事物的研究都看作“无用之辩,不急之察”,表现了一种狭隘的态度。墨家比较重视分析方法,《墨子》书中所保存的《墨经》、《经说》显示出墨家的分析思维的光辉成就。阴阳五行是中国古代长期以来最流行的观念。阴阳观念在西周时代就提出来了,到《周易大传》建立了关于阴阳的详细理论。五行观念是《尚书·洪范》提出来的,战国时期稷下学者邹衍建立了关于五行的详细学说。管子学派主张,认识外物应力求避免主观的干扰。《管子·心术上》提出所谓“静因之道”,它说:“因也者,无益无损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这是说,在认识外物的时候不要对于外物有所损益,力求认识外物的本来面目。

大钧、明强本于我关于儒家博采众议的思想观点的论述,认为齐鲁人物具有谦虚谨慎和礼贤下士的传统。他们赞同我的观点:传说释迦牟尼曾经宣称:“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而孔子却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在这一方面,孔子的谦虚态度是值得敬佩的。《荀子·尧问篇》中记载了周公的一段故事:伯禽将归于鲁,周公曰:“吾所执贄而见者十人,还贄而相见者三十人,貌执之士者百有余人,欲言而请毕事者千有余人。于是吾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于十人与三十人中,乃在百人与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为之貌,下士吾厚为之貌。人人皆以我为越逾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后见物,见物然后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女以鲁国驺人,几矣!”这叙述了周公礼贤下士的谦虚态度,未必是周公的真实故事,但表现了儒家的思想观点。最值得注意的是,周公所得的三士,不是在上层人士之中,而是在一般群众之中,所以对于地位较低的士更应加以尊重。对于上士,可“薄为之貌”;对于下士,则应“厚为之貌”。必须接待多士,“然后知其是非之所在”。这都表示广询人言的必要。这具有非常深刻的含义。

大钧是我同窗至友维石教授之子。1992年7月,山东师范大学召开“庆贺庄维石教授执教六十年纪念大会”,我在致大会的贺信中说:“回忆二、三十年代,我与维石同志一起在中学、大学读书,朝夕共处,促膝畅谈,往昔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嗣后维石同志专精文学,拙愚致力于哲学,虽研究的范围不同,而爱国之心、追求真理之志,契合无间,彼此同之。维石同志学识渊博,士林称颂;著作宏深,誉满海内。”今其子大钧与其学生明强共同主编《齐鲁人考索》丛书,亦曾蒙维石教授指点,质量定有保证。大钧、明强以此书的规划见示,并邀序于我。我认为这是一部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于是略述对于齐鲁人物的观感,作为序言。

一九九八年一月

张岱年 于北京大学

《齐鲁人考索》丛书序

董治安

齐与鲁,是我国始建于西周初年的两个诸侯国。武王既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姜太公)于营丘,是为齐;封周公旦于少昊之墟曲阜,是为鲁。由此以迄春秋战国数百年间,两国虽各自经历了兴衰升降的种种变迁,却都称著于当时,并以其政治和文化的成就在历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

与鲁国相比,应该说,在相当一段历史时间内,齐国居于政治大国和军事强国的突出地位,引人注目。姜齐本非姬周的同宗,但太公于“翦商”过程中建立过奇勋大功;而营丘一带本系殷商与国薄姑的故地,师尚父的受封显然出自“夹辅周室”的政治目的,有其特予重视的用意。而由于地处“海岱之间”,擅鱼盐之利,加以实行“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齐太公世家》)的正确方针,齐国遂迅速地增强了实力,并在吞并诸小国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的宏大版图(参见《左传·僖公四年》)。春秋前期,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史记·管晏列传》),成为声威赫赫的中原霸主,标志着一个新历史阶段的开始。其后,尽管姜齐公室一度趋于衰落而卿大夫屡起纷争,国势转弱;但进入战国,田氏逐步取代姜氏掌权,于威(前356--前321)、宣(前320--前302)、

(前01--前284)三世,齐国在经济发展、重建国力的基础上,两次大败魏师,南胜荆楚,西震嬴秦,再度称雄于东方,为举足轻重的强国。也是在威、宣之世,田齐执政者设“稷下学宫”,延揽天下贤士,“各著书言治乱之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盛极一时。《汉书·艺文志》所谓“九流十家”中的儒、道、阴阳、法、名、墨等各类代表人物,都曾在这里留下踪迹,使临淄成为思想学术交流的重要中心。

周公封鲁(实由伯禽代为受封),同样是周初“封建亲戚,以蕃屏

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的重大政治举措。周公旦是武王之弟,摄政成王期间,曾亲自平武庚、三监之乱,又实行分封、制礼作乐,使姬周统治得到空前的稳定,位尊权重自不待言;而曲阜一带为商奄故土,东临诸夷,南望徐淮,属战略要地;以曲阜之地封周公,充分表现了姬周对鲁国的特殊倚重,也显示了鲁国地位的非比寻常。迄于西周中后期,可以说鲁国一直受到王朝的明显关注,在东方诸侯国中保持着不可小觑的特定地位。然而,由于在施政方略上过多延续既有传统而较少与时俱进的变革,与齐国相比,鲁国的发展却显得相对迟缓。进入春秋,以“三桓”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弄权乱政,鲁国公室日趋衰微,齐、鲁差距进一步扩大。由此以至战国,鲁国的历史演进呈现为双向的内容。一方面,尽管一段时间内,鲁国也曾先后兼并周边若干小国,取得过“伐宋”、“败齐”之类的表面胜利,陆续参加了一些会盟等外交活动等等,显示了本身的存在,总的看来国力却呈下滑之势,由中等诸侯国沦为小国地位,成为齐、楚等大国争霸的配角甚至牺牲品。但另一方面,鲁人仰慕周公,尊重礼乐传统,从而在保存和发展典章制度、弘扬思想文化方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在鲁“观乐”,几遍及《诗》三百并多种周舞;同书《昭公二年》又载晋韩宣子在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春秋》而有“周礼尽在鲁矣”之叹;均非偶然。春秋后期“至圣”孔子诞生于鲁,并在鲁设教授徒、整理“六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不仅影响广及于东方,且使天下注目于鲁。而战国之时被称为“显学”的儒家和墨家学派,其发源与主要活动地区,亦大体在于邹鲁一带。

由此可见,齐与鲁是先秦时期两个重要的诸侯国。著名的《左传》一书,编年记述春秋至战国之初各诸侯国的史事,所载齐、鲁两国史实约占全书的近四分之一。在另一部国别体记载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史事的《国语》中,“鲁语”37篇,“齐语”8篇,二者约占总篇数的五分之一稍弱。另外,以记载战国史事为基本内容的《战国策》一书,其中“齐策”59篇,以字数论仅次于秦、赵两策,而超过了魏、楚、燕、韩等其它十国策文。这都从又一个方面反映了先秦时期齐、鲁两国历史存在的不可忽视。

其实,齐、鲁地相毗连,所谓“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史记·货殖列传》)春秋以降两国过往频繁、联系密切,交互影响愈来愈多。战国中期以后,已经出现“齐”、“鲁”连称(参见《庄子·盗跖》、《荀子·性恶》)。事实说明,至少在纪元前4世纪左右,人们已经逐渐习惯于把“齐鲁”视为一个泰山南北较大地域的统名,其地东至于海、西邻三晋,南接楚地、北连燕境。人们对于齐、鲁古史或古文化的研究,在重视国别史之科学梳理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到齐、鲁之间的特殊联系,以及对于“齐鲁”之作为地域统名的传统理解。

汉代班固撰《汉书·古今人表》,始为创例,把“上自宓戏,下逮秦亡”的约两千个人名集于一册,被学者誉为“从事(秦以前)研究工作手边必备之书”。清人梁玉绳复为摭采群编、订补史料,成《汉书人表考》,至今嘉惠学林。庄大钧、王明强同志主编的《齐鲁人考索》(丛书),虽专以先秦齐鲁人物作为考索对象,而卷帙的浩繁、内容的丰富,又超过了上述两书。

大钧同志长期从事齐鲁文化的研究,而以两周齐鲁人物作为考论的重点。文明社会的历史,本来就是各代具体人物的活动史。大钧试图从人物的汇考、论析入手,对先秦齐鲁文化作出深入的探索和新的总结,无疑是一个具有学术开拓意义的宏大规划。两周齐鲁文化(包括人物)的研讨,自汉以来可以说代不乏人,最近二十年有关论著所见尤多。然而,对于约八百年间的历史人物逐一加以考订,论述其生平,评定其地位,进而从更为宏阔的幅度展示齐鲁历史文化的总体面貌,虽有大量前人的成果可资利用,而有待订误补缺之处仍可谓比比皆是;至于建构整体框架,厘定人物评价之基本原则和具体尺度,甚至把浩如烟海的各种史料汇于一编并加以去伪存真这一工作的本身,显然都需要付出创造性的劳动和艰苦的努力。《齐鲁人考索》(丛书)的编撰、出版,是以庄大钧同志为首的一个学术群体之共同的学术奉献,而首先是凝结了大钧同志大量心血,体现了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追求。

《齐鲁人考索》(丛书)的材料处理和内容安排,有如下几个的学术特点,值得注意。

第一，汇收齐鲁人物所用基本史料，严格限于先秦时期的经、

史、子籍，并金石、简帛文献等，而悉予收录，力求全备。两周人物，年代久远，史料繁多，秦汉以后的诸多典籍提供了可资参考的重要内容，然而，立足于考信的原则，在基本事实的寻绎中溯本求源，应该承认，先秦文献资料毕竟有其无可代替的独特学术价值。悉数收录全部有关文献资料，也能有助于避免片面性，以至通过比较考论，在较大程度上客观审视两周人物的本始面目。

第二，汇收齐鲁人物的具体范围，从历史断限看，主要是周初至春秋战国时期齐、鲁两个诸侯国的各类人等，同时还酌收了部分先周齐鲁地区的历史名人，以至此一地区的神话、传说人物等；就地理区划而言，则除齐鲁两国辖地全部见载人名悉予汇录以外，也酌收了部分属于较大统名之齐鲁地域的人物，或曾经一度客居于齐鲁的人物。这反映了编撰者重视历史研究的前后联系性，以及强调科学性与尊重传统相统一的郑重态度。

第三，本丛书计分“通检”、“汇考”、“综论”三大部分。“通检”汇编人名并全部文献资料的出处，“汇考”收集有关人物种种问题的重要考辨资料，“综论”为一定人物历代主要评论意见的集成。由此可见，从整体说，本书既可帮助查找古代齐鲁人物，带有工具书的性质，又能够多层面显示历代有关齐鲁人物研究的各类成果，具有特殊的学术参考价值。

大钧同志入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十多年来，我们之间既有师生之谊，复经一起共事，相知较多。承大钧厚意，嘱我为序，情难推辞，因述个人琐见如上。不当处，望予指正。

董治安 于山东大学南园

2000年6月11日

通检(一)说明

《齐鲁人考索》丛书包括三大部分:一,通检部分;二,汇考部分;三,综论部分。其中通检部分收录先秦文献中全部齐国、鲁国人物(包括神话、传说中人物和确曾客居齐、鲁者)的全部名称(包括姓、氏、名、字、号及别称等),列明该人物所在的书名及篇名(或卷数)。《通检》(一)是本丛书通检部分中的一部,汇录《春秋》、《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中全部齐国、鲁国人物的各种名称。

本书以人物的本名或最通行的名称为主条目,其他名称为附条目,附条目列于主条目之后。主条目加鱼尾括号,附条目加圆括号。主、附条目下均以阿拉伯数字标明该名称在《春秋》经、传中出现的次数,例如:【仲孙何忌】14(何忌 1、仲孙忌 2、孟懿子 7、懿子 3、孟孙 10、孟 1),即表明“仲孙何忌”为主条目,其在《春秋》经、传中出现的次数为十四次,“何忌”、“仲孙忌”、“孟懿子”、“懿子”、“孟孙”、“孟”为附条目,其后的阿拉伯数字即为该名称在《春秋》经、传中出现的次数。

主、附条目下有人物简介,其后排列人物史料。为保持文意的完整性和便于阅读,酌情将人名所在句前后文字做必要的改动和省略。人名所在句的文字一律不变。同一篇中每节文字之间以“——”,于末节文字之后标书、篇名。

人名出处的排列顺序为:《春秋》、《左传》(简称“左”)、《公羊传》(简称“公”)、《穀梁传》(简称“穀”)。书、篇名用简称,例如:《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标作《春秋·僖三三》、《春秋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标作《左·僖三三》、《春秋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标作《公·僖三三》、《春秋穀梁传·僖公三十三年》标作《穀·僖三三》。所引文字皆以在各书中出现的前后为序排列。若人名用字三传不同,则加圆括号标明,并出附条。

本书正文主条目按首字笔画数多少为序排列;笔画数相同,则以笔画的横、竖、撇、点、折为序排列;单字条目在前,多字条目在后;首字相同则按第二字的笔画排列,首字和第二字的笔画都相同则按第三字的笔画排列,余者类推。字全相同则以首条史料在文献中的前

通 检 (一)

目 录

《齐鲁人物论略》张岱年	1
《齐鲁人考索》丛书序 董治安	1
《通检》(一)说明	1
《通检》(一)索引	1
《通检》(一)正文	1
后记	366